

数字经济下大学治理场域的结构体系及演化逻辑探究

赵天乐,王兴超

(山西大学 太原 山西 030006)

摘要:场域视角是观察高校治理的重要“窗口”。现有研究仅限于社会场域表层意义下的隐喻和“嫁接”缺乏更深层级的理论结构探析和演化探究。基于场域-惯习理论,通过理论探析构建了数字经济条件下大学治理场域的结构体系,阐释了数字经济影响下大学发展背后场域演化的底层逻辑。研究发现,大学治理框架由创新资本场域、组织能量场域、数字场域和高层治理者能力场域等四个元场域组成。四个元场域相互有机作用,作为整体呈现出“资本供给矛盾-惯习转变-资本积累及优化配置-矛盾解决-场域演化-大学发展”的链式逻辑演化机理。

关键词:场域;大学治理;数字经济;惯习;资本

中图分类号:G52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24)02-0061-06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4.02.013

自然界存在场和实物粒子两种物质存在形态。场作为充满意义和秩序的空间,在自身规则或逻辑作用范围内有一定的辐射界域,即为场域。场域理论生发于物理领域,1975年随着皮埃尔·布迪厄的《科学场域的特殊性》一文的发表,场域理论在教育、心理这一类学科范畴内得到隐喻萌发,后延伸到哲学、新闻等泛文化社会领域,衍射出诸如“文化场”“话语场”“权力场”等语义概念。聚焦到大学治理领域,在中外主流文献库搜索识别发现,相关的理论研究几乎处于理论盲区,只有概念表义层面的隐喻和“嫁接”,缺乏对大学治理场域相关概念、内涵、结构、演化逻辑等主题严谨和规范的探究。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以数字、信息和知识为代表的生产力创新元素,加快了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结构融合和重塑,改变了人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也对跟高校职能紧密相连的人才链、知识链和创新链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进而挑战传统大学传统治理模式。伯顿·克拉克经典三角模型指出,从外部作用力来看,大学主要受政府、市场和学术等三种力量影响。高校作为社会有机系统的构成部分,已经很难脱离外部场域的作用而单独存在。面对数字经济的冲击,大学理应以内部场域为主,适时适时引入或嫁接外部场域资本,实现内外场域互联互通、共荣共生,进而构建内部和外部场域双循环系统,推动自身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从资本、惯习等涉及高校治理的核心要素出发,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运用于大学情境下的治理实践,研究数字经济中高校治理场域的构成和演化逻辑对大学发展而言

富有实践价值,能提升大学整体的博弈格局,实现帕累托效率改进。本文通过隐喻和理论分析方法,在以下方面实现了创新:一是阐述了大学治理场域中,数字环境、高校治理惯习、治理资本之间的逻辑链式关联性;二是实现了大学治理场域在结构上的元场域划分;三是刻画了大学发展背后的场域演化逻辑。

一、数字经济下大学治理场域的理论探析

1. 相关概念的界定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既有学者倾向于从产业融合和价值创造的角度来定义数字经济^[1],也有学者从纯技术经济范式的角度来定义数字经济^[2]。这两类定义颇具代表性。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期间,官方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本文采用最后一种定义方式,此定义很好地兼顾了以往数字经济概念的特征,既突出了数字、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元素的重要属性,也突出了数字技术的产业融合特征和多价值目标取向。

大学治理的内涵阐释较为清晰,总体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部分。本文沿用相关学者的定义,即大学内部治理指的是大学内部组织及其权责的关系结构和运行程序,大学内部治理的科学性及现代化水平是决定一流大学建设和

收稿日期:2023-03-29

作者简介:赵天乐,山西大学国内合作与交流处(校友办)管理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组织生态与创新管理、大学治理;王兴超,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青少年道德推脱与欺凌行为、道德推脱与不道德决策、大学治理。

大学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基础^[3]。大学外部治理可理解为大学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对大学在办学治校过程中的行为及决策进行的规范、监督、制约活动和制度安排,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各级政府以及相关市场主体、媒体、社会组织、公众等各类社会主体^[4]。

布迪厄最早提出“场域”概念,将其概述为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参与者的综合及其动态关系。布迪厄虽然没有给出场域的标准定义,但他提出的“场域-惯习”理论指出了社会学场域理论分析的基础概念框架,即场域-资本-惯习等三个概念及关系,并为此作出了经验性的阐释^[5]。因此,讨论场域,必须讨论资本和惯习两个子概念。资本的概念由来已久,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中,资本具有广义性,泛指竞争和冲突中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等。投射到高校系统,资本是一所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是与其他大学竞争博弈的基础,即通常所说的“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惯习即“性情倾向系统”,它有助于把场域建成一个富有意义和秩序的世界,即一个被赋予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和尽力的世界^[6]。有学者在解读布迪厄的惯习思想时认为,惯习是在意识层面发挥作用、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包括个人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7]。由此可见,惯习与大学治理过程中的内外环境息息相关,是高校所在“硬环境”和“软环境”的结合体,是一类由规则、制度、规范、策略等组成的与大学生存逻辑相关联的集合。惯习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的功能^[8]。从本质上讲,惯习就是大学的生存之道也即办学历程所呈现的依赖路径。通过对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的深度解读,张国举提出了自己对场域的解释性定义,即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共时态与历时态、充满冲突和竞争的关系网络社会空间^[9]。相对独立说明场域具有界限模糊性,符合高校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特征。共时态说明拥有不同资本数量的场体在场域中具有不同占位,其位置、地位和权力的不同决定了拥有资源量的大小,从而构成共时态的场势差异。场势差异的存在成为各类型场体竞合的动力:既得利益者试图维持和扩大自身场势,利益颠覆者试图改变自身较弱的场势地位,此种斗争促使场域内的资源重新分配,直至达到短暂的平衡,之后继续循环往复这一博弈过程,体现出场域的历时态特征。高校在治理过程中,无论是将自身置于更为广阔的宏观场域中,还是仅仅针对内部场域,都会面对因资源争夺而导致的场势博弈。场域内外的冲突和竞争皆因多元场体要争夺更多的资本而引发。布迪厄认为,这一争夺行为使得场域空间变得富有意义,各种隐而未发和正在活动的力量不断重塑着场域的构型^[10]。

经过上述讨论,结合研究情境,本文将大学治理场域定义为:大学治理框架背景下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由资本和惯

习决定大学生存和发展的、由共时态与历时态共同确定大学发展占位和演化逻辑的、充满竞合关系的网络社会空间。

2. 数字经济、惯习和资本等三者的相互关系

广义来讲,生产要素和资本统辖的范畴相近,都是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而价值的创造或效率的提升可以作为资本运作的效果来看待。从这一视角出发,审视既往的数字经济文献发现,讨论数字经济与资本二者的理论因果关系成为目前学界聚焦的方向。乔岳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分配效率,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模式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型发展^[11]。黄群慧等人发现,互联网通过减低交易成本、缓解资源错配和提升创新水平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12]。Graetz and Michaels 研究结果也表明,工业机器人能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3]。综合来讲,这一类文献的积极意义在于正确揭示了数字经济与资本之间的正向效应。数字经济对高校治理的积极作用同样影响深刻,体现出如下逻辑:数字经济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引导人们消费模式的变革,进而实现了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深度重构。价值链条的形塑递延到高校,推进了大学治理者对传统高校职能进行再思考和重新定位。于是,大学通过人才链、知识链和创新链的优化和更迭,不断寻求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人才、文化与科技输出模式,最终再次适应甚至引领社会的发展。上述因果关系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越快,对大学的治理关联性越大。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对商业行为也会产生负面效应,而且同样会传递到高校治理领域。该负面作用是由于高校治理层忽略两个重要的前提而引致:一是数字经济与商业行为、高校治理的正向效应是在正确的适配基础上产生的,并非所有的数字化转型行为都能产生积极的价值正向反馈。在数据资源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不匹配的情况下,数据要素快速积累引致的高存储成本同样会占大量生产资源,造成资源错配^[14]。二是数字经济与资本之间的作用机理,如果缺乏惯习的联结,也即场域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容易陷入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关系探讨中。基于以上两点不足,为了更好地探讨数字经济、高校治理惯习和资本配置之间的逻辑概念框架,有必要对其之间的链式作用关系作出讨论。

一方面,数字经济的概念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范式就是一场技术经济范式,实现了对传统工业经济范式的逐步替代。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本质是价值观的转换。高校价值观、初心和使命本身就是指导大学治理行为的准则,是大学追求的长远目标。作为高校生存和发展的依据,大学的价值观、核心职能同样也是大学一系列治理规则、方式和策略运用背后的核心逻辑。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对大学治理场域惯习(即办学路径)的形成和

改变具有深度影响。何少娴和尤泽顺指出,行为者从现有场域中解读出蕴含在其中的各种可能,并根据自己的位置不断构建对世界的理解,采取相应的行动;行为者在实践中学习、掌握和运用规则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社会结构^[15]。此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数字环境下对智能场域的再认知、再适应以及参与程度的调整。因此,数字经济环境与高校治理惯习之间的互相影响是一种双向决定或塑造的过程。正如张意所言,在场域关系集中,行动者主动参与并具有创造性,行动者在受场域制约的同时,仍然抱有改造建构场域的倾向和可能^[16]。

另一方面,高校治理场域惯习决定着大学内各资本要素所有者(即大学治理者)根据其动机、权力和位置等禀赋不同对要素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方式、规则和策略,承担着制度合理性的关键角色。孟科学和雷鹏飞认为,组织场域的制度环境保证了成员之间交互的稳定和持续,明确了成员的行为规范以及场域边界;场域成员的行为只有与制度环境匹配才能获得组织合法性,为资源可得性提供基本条件^[17]。在大学治理运作过程中,惯习发挥着类似组织能量场中的“场用”的功能,让治理者能够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方式行动,对各类资本实施优化配置,影响资本的流向。同样,各类资本的最终运作效能也能反作用于场域惯习。当一种资本投入能产生正向价值时,就可以固化行动者的认知,让惯习得以强化。当某种资源投入不能起到想象中的效果甚至起到反作用,就会促使治理者对惯习进行再调整。总体而言,惯习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影响或作用取决于资本的最终配置效率。

在高校治理场域内,当数字经济环境与惯习之间的双向作用匹配效果以及惯习和资本之间的双向作用能效都呈现出积极的正面反馈时,就必然会推动高校场势的上升,让大学在获取资源、信息、政策、权力等方面占据更多优势,改善其在场域共时态情形下的地位。基于以上探讨,图1展示了数字经济、治理惯习和治理资本三者之间的链式逻辑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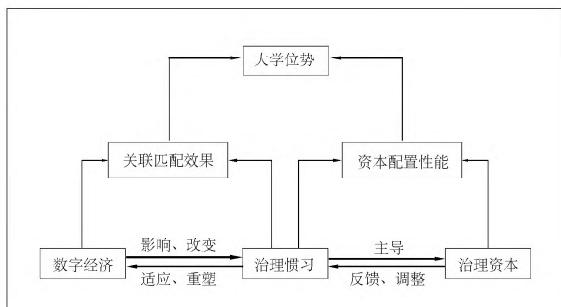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经济、治理惯习、治理资本链式逻辑关系

3.数字经济下高校治理场域的元结构理论划分

社会是一个大的人工生态系统,由许多相对独立的较小系统构成。这些小系统就是一个一个充满秩序和规则的小世

界,在各自惯习的激励相容作用下,各类资本运作其中。事实上,小世界就是一个个较小的场域,它们作为元场域可以组成较大的场域,如果空间足够大,就可以细分成更小的子场域。聚焦到大学,作为社会生态子系统,大学为各种利益关系集合体所包裹,是一个关系网络社会空间。在大学治理场域内,无论是制度化的规章细则,还是约定俗成的非规范化行为方式,都构成了大学特定情境下的惯习,在惯习的引导下,高校内外资本被配置,并根据其功效反作用于场域。毫无疑问,高校作为一个场域存在,惯习的复杂性和资本的多元化决定了大学治理的复杂性。基于此,从场域视角下对大学治理结构进行剖析,找出若干相对独立的元场域,并试图解析出高校治理惯习和资本运作的常规逻辑,有助于高校的长期演化发展。吴特和史曲平指出,结构特征分析是组织场域分析的关键方面之一^[18]。

高校治理场域因大学具有的特殊社会职能自然属于强场域,又因其开放性,同样属于模糊场域。尤其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使得治理场域内外利益相关体间的联结逐渐升级,且强度逐步增强。实际上,数字经济所形成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人力资源、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文化建设等环节的协同发展和有机整合,全面提升了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发展水平^[19]。高校作为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力量,在资源汇聚和融通上占据着重要的功能节点和位置。显而易见,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场域元素间丝丝相连、环环相扣,元结构划分的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而且大学内外部治理之间必然是“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长期性、协同性的,任何片面性、线性、局部性、短期性、割裂性的改革举措都难以取得预期成效”^[20]。因此,大学治理元区域划分绝不能陷入“还原论”的桎梏,这与客观事实不符。何哲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集聚效应会更加明显,资本的循环速度和增值速度比传统工业时代快了许多,从而加速了传统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过程,而且数据对其他生产要素具有乘数作用,利用数据可以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从而放大资本等要素在社会各行业中的价值^[21]。与此同时,考虑到大学治理场域内的资本(泛化的“资源”)运作是治理者重塑场势的重要组织行为,结合二者,不妨从资本积聚效应出发,对大学治理场域作出探究式的元场域理论划分。

在创新资本理论中,物质资本历来与金融资本、货币资本联系较为紧密。在数字经济条件下,这一联结强度得以继续提升。锚定到大学治理场域,在“教育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律限制下,高校不会参与纯粹商业行为的金融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运作,但是为了积聚办学资源,大学仍会通过多元化渠道去聚集各类办学资本,比如大学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本(基础设施、科研设施等)、货币资本(办学经费)以及利用外界金融资本为高校职能开展创造条件等。在一流大学竞争比拼中,创新资本无疑是各高校比拼的重要指标和大学发展

的资源保障,是大学治理的重要方面。为了便于场域识别,把这一类关涉大学发展的“有形资本”聚集、旨在打造大学“硬实力”的元场域称为“创新资本场域”。

第二类资本类型积聚现象主要围绕大学“无形资本”展开,表现为大学“软实力”的构建。戚聿东和肖旭研究揭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企业组织变革,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推动组织模式由传统科层式的“垂直化”结构转变为开放式的“扁平化”结构,带来管理效率的提升^[22]。而且数字化转型能帮助企业从机械式运作方式转变为生命式运作方式^[23]。大学作为典型的科层式组织结构,同样面临管理效率和有机协同式运作方式的双重提升需求。客观上,数字经济的冲击确实加速了大学文化的重塑,诸如制度资本、学术资本和声誉资本等一系列有助于提升正能量激发的资本类型逐渐成为大学“软实力”构建的重要支撑,构成大学“文化场”的组成元素,是大学宏观治理的重要维度。不妨将第二类大学治理元场域称为“组织能量场域”。

王瑶琪等人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学需要把握时代特点,依托自身组织优势与人才优势,化挑战为机遇,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成果,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24]。

作为数字经济最为核心的元素,数据具有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性生产要素双重属性,这意味着数据也拥有了资本属性。此外,从数字经济的定义中可以解析出,数字、信息和知识存在天然的联结。这种联结在知识管理中得以充分体现,即数据间的联系是认知信息的基础,信息间的模式关系是认知知识的基础^[25]。在现实中,数字经济对高校治理的影响除了正面效应以外,最为关键的是对高校意识场、学术场和知识场的供需体系的优化重构,让学校信息场域的输入输出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但同时,大学对此的相关治理也变得日趋复杂。为了突出数字经济在高校治理场域塑造中的凝结催化作用,将数据资本、信息资本和知识资本聚类的元场域称为“数字场域”。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科夫卡认为,每个人都有表达意识行为的“行为场”以及心理行为和生理结合的“心物场”,它们统称为“心理场”。莱温认为,每个人都会受到既有个体自身的力又有来自外部影响个体的各种“能量场”的诱力。在大学治理场域中,高层治理者肩负着场促和场结双重角色,既是高校资本来源的重要协调者,也是资本优化配置的掌管者。高层治理者因其地位和职能的特殊性,拥有天然的“心理场”。这一场域的能量发挥需要借助于如个人威信、人格魅力或管理机智等方式传导给他人,以达到强大的舆论共情效应。高校治理层的这种“气场”在数字媒介的价值辐射下,其能量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现如今,如“网红校长”这类流量级现象就是大学高层领导者能量场域价值运作的表现形式之一。据此可以发现,无论是大学治理还是高校内外

资本构建,大学高层治理者所拥有的异质性人力资本所发挥的效能对一所高校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突出大学高层治理者在场域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将这类元场域称为“高层治理者能力场域”。

大学治理是大学内部治理和大学外部治理的辩证统一,正确理解大学内外部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从价值逻辑、政治逻辑、行政逻辑、社会逻辑和文化逻辑等多向度关系逻辑加以把握^[26]。而大学治理元场域的划分同样遵循着价值性和工具性的内生发展逻辑及其相互间的外生资本勾联。这里的价值性基于高校核心职能的挖掘,工具性围绕制度、文化、治理人员素质、资本等要素展开。至此,本文通过理论构建,勾勒出能表述大学治理场域的四个元场域构面,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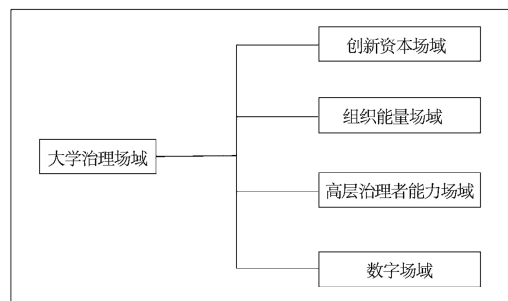


图2 大学治理场域的理论结构划分

4. 大学治理场域的理论演变逻辑

从宏观角度看,整个中国经济系统就是一个场域。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经过多年的时间演变,该场域在空间结构上具有诸多特点,总体呈现东部地区向中西部扩散、经济强省向邻近省份指向性溢出等演进规律,而且邻近省份间更容易形成同一凝聚子群、共同发展的局面^[27]。随着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演进呈现出速度快、渗透强、辐射面广等特征^[28]。高等教育学理论认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而场域分布的经济特征,恰恰表明,中国高等教育强弱分布的区域特征与宏观经济系统十分相似,使得高等教育场域也具有宏观经济场域中的扩散和凝聚特性。与此同时,自组织系统理论在解释宏观和微观关系上也强调,宏观现象的涌现往往来源于个体微观行为的作用,不仅是宏观场域具有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大学治理微观场域同样具有结构演变特征。在寻求场域结构演化的动因上,布迪厄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场域内只要存在共时态的场势差异,场内行动者就会为提升或缩小场势差异而冲突和斗争,冲突和斗争成为推动场域历时态演变的核心驱动力。上述场域理论关系同样适用于高校治理领域,将一所大学置放在区域乃至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内就会发现,大学治理场域所面临的治理界阈,不会仅仅面向高校本身,只要身处高等教育系统体系内和社会大环境中,大学面向外部治理就难以避免,这是由场域的开放性所决定的。大学间或大学与其他实体间因各自在网络关

系节点上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在功能结构上存在位置差异,使得高等教育场域内外一直存在为占据各类资本而冲突和斗争的动力。一些掌握关键资源的场域成员往往具有较大影响力,对其他网络成员构成遵从压力,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大学只有接受或妥协,才能在场域中生存和发展。同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学为了更好地生存,也在不断积累和优化内外部社会资本结构,对位势较高的社会实体(包括大学)构成挑战。就这样,大学治理场域在内外场体间的资本竞合中被推动着不断演变。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任何组织都有生命周期。大学沿着生命周期由弱变强不断跨阶发展是大学治理场域演化的主线。在大学发展至最高形态前的各个阶段,它在场域中的占位是不同的,呈现逐阶抬升的趋势。大学治理场域的结构特征也在阶段间呈现出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刻画了大学治理场域的演变趋势,表现出固有的逻辑性:大学治理场域结构的共时态特征是由资本结构的阶段性分布决定的,而场域结构的历时态特征则受大学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发展特性所牵引和塑造。从发展方式视角看,各个阶段的发展特性是场域惯习的一种体现。大学要谋求发展壮大由弱变强,必须实现阶段间惯习的转变,生存方式的转变带来大学资本在四个元场域间的重新配置,进而改变或者优化大学场域整体结构,实现功能结构上的帕累托迭代。在此过程中,大学资本的质与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和区域社会关系网络中多样化组织之间开展竞合去整合资本,这些组织包括科研院所、政府、企业以及其他与大学发展密切相连的第三方。在竞合过程中,大学需要通过汲取高场域组织中的优质资本为己所用,也可以通过向低场域组织辐射自身资本以获取综合影响力。这个双向交互活动可以理解为大学为了发展吸收外界能量或扩散自身能量的过程。一旦资本与优化调整后的惯习适配成功,资本的增值效能就会提升大学场势,促进大学不断沿着生命周期攀升,这就是大学治理场域沿着生命周期演化的底层逻辑。

通过对大学治理场域运行机制的理论探究,最终的场域理论演化逻辑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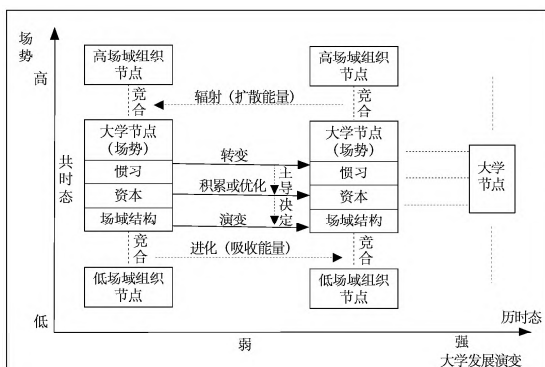


图3 大学治理场域理论演化逻辑图

高等教育治理实践告诉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数字经济下数字场域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在不同的大学发展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且其本身的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这决定了大学治理场域的营建跟大学拥有的资本及其治理重点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因为资本的流通循环,场域间的外部性和相关性表明,在满足场域内资本与惯习相匹配的前提下,数字场域与其他三个场域之间存在积极的正向促进关系,场域间也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数字场域的建设有助于其他场域的建设,其他场域的建设也在无形中促进数字场域的发展,恰恰是场域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关系,推动高校治理场域不断演化。有学者指出,大学新的治理模式之所以“失灵”,很大的原因在于治理模式与传统管理路径间缺乏适宜的调试,同时新的治理实践缺乏针对性等问题^[29],而本文构建的大学治理场域理论及其演化逻辑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治理难题。

二、结语

1. 结论

本文依托场域-惯习理论,首次探讨了数字经济下大学治理场域的结构体系及演化逻辑。具体结论为:一是阐释了数字经济条件下数字经济、治理惯习和治理资本等三者之间的逻辑链式关系;二是搭建了大学治理场域的基本结构框架,大学治理场域由创新资本场域、组织能量场域、数字场域、高层治理者能力场域等四个元场域构成;三是大学治理场域的演化逻辑是:大学为寻求发展,需要解决低阶资本供给与高阶资本需求间的矛盾,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治理惯习(即大学生存之道)的逐步转变,进而指导各种资本类型的积累和优化配置。如果资本的配置效能可以有效缓解或解决大学发展中的瓶颈点,就能推进大学各元场域的跨阶发展,最终实现大学的演进。

2. 启示与展望

场域理论开启了观察大学治理的新视角,相关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目前大学治理场域的研究仍处于理论和实践盲区,有巨大的研究拓展空间。

惯习和资本是场域理论中的核心要件。惯习涉及大学的生存策略,资本是大学生存的根本。在大学治理实践过程中,大学高层治理者往往主导着企业惯习,而惯习却决定着资本的配置方向,资本的配置效能关乎大学的发展。这样的逻辑链条串起和牵涉诸多事关大学治理的关键要素,值得进一步作出理论探究。

数字经济加剧了大学场域内外各个利益节点间的联结,增强了联结的强度和广度,使得各种场势的形成和交融更加复杂。从场域的角度来探究这种“能量”关系网络有其本源的优势。

参考文献:

- [1]何玉长,刘泉林.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价值本质与价值构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57-66.
- [2]杨青峰,李晓华.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结构、制约因素及发展策略[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26-136.
- [3]睦依凡.转向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创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紧要议程[J].教育研究,2020(12):67-85.
- [4]叶陈刚,王孜,武剑锋,等.外部治理、环境信息披露与股权融资成本[J].南开管理评论,2015(5):85-96.
- [5][6][10]BOURDIER P,WACQUANT L J D.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17,172,139.
- [7][9]张国举.创新场域论[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7:20,79.
- [8]BOURDIER P.The logic of practice [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 [11][19]乔岳.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6):51-57.
- [12]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9(8):5-23.
- [13]GRAETZ G,MICHAELS G.Robots at Work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8(5):753-768.
- [14]WAMBA S F,GUNASEKARAN A,AKTER S.Big data analytics and firm performance: Effects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7(1):356-365.
- [15]何少娴,尤泽顺.建构、场域及符号权力:布尔迪厄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影响[J].东南学术,2017(6):226-232.
- [16]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17]孟科学,雷鹏飞.企业生态创新的组织场域、组织退耦与环境政策启示[J].经济学家,2017(2):43-49.
- [18]吴特,史曲平.组织场域、制度约束与银行业战略选择——立足于组织社会学的分析[J].经济经纬,2011(2):138-142.
- [20]林杰,张德祥.中国高等教育外部治理现代化:理想目标、现实困境及推进策略[J].中国高教研究,2020(3):4-10.
- [21]何哲.数字剩余价值:透视数字经济体系的核心视角及治理思路[J].电子政务,2021(3):17-27.
- [22]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J].管理世界,2020(6):135-152+250.
- [23]杜传忠,张远.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21(2):41-51.
- [24]王瑶琪,聂建峰,张芳.加快智慧校园建设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J].中国高等教育,2021(19):24-26.
- [25]FILEMON A,URIARTE J R.Introduce to knowledge management [M].ASEAN Foundation.Jakarta,Indonesia,2008.
- [26]常亮,杨春薇.大学内外部治理关系的逻辑、调适与中国情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3(2):38-46.
- [27]赵放,刘雨佳.中国数字经济的联系强度、空间结构与发展策略[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99-108.
- [28][29]刘健,邹晓平.大学治理:好制度何以失灵? [J].高教探索,2017(12):11-15.

Structural System and Evolutionary Logic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Field in Digital Economy

ZHAO Tian-le, WANG Xing-chao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field perspective i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observing university governance. Existing research is limited to metaphors and “grafting” in the superficial sense of social field, lacking deeper theoretical structural and evolutionary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field habitus theory,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structural system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fiel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lains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field evolution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university governance framework consists of four metafields: the innovation capital field, the organizational energy field, the digital field, and the senior management ability field. The four metafields interact organically with each other, presenting a chain logic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capital supply contradiction – habitual transformation –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optimal allocation – conflict resolution – field evolution – university development” as a whole.

Key words: field; university governance; digital economy; habitus; capital